

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版本考略

严 佐 之

东汉人文集存世者仅蔡邕一家,蔡邕文集历经传刻传抄,留下不少珍善版本,比如在铜活字印本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明正德锡山华氏兰雪堂铜活字印本《蔡中郎文集》,在影钞本中具有典型意义的黄丕烈影钞兰雪堂活字本《蔡中郎文集》,还有黄尧圃、顾千里就《蔡集》校勘而留下的诸多精彩校跋,以及后世诸多名家的过录校本,等等^①。然而,《蔡集》版本之多之善虽让人目不暇接,却不料仍有遗珍“浪迹天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曾从津门书铺购得一笔明清时代的古籍刊本、抄本,其中不乏善本珍籍,而清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十卷,尤称翘楚。这批古籍归属校图书馆所有,盖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书”印,但因是古籍所出资购置,以为古籍版本学教学之用,故长期以来一直度架敞所资料室。每次讲至明清名家批校本,都会取出这部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展示观摩。虽说从未存“秘不示人”之念,然因其尚未正式入录校图书馆古籍书目,故终属“名不见经传”者,或亦职是之故而知者甚少。兹不揣简陋,略考版本,谨献同道共赏,惟求高明指教。

一、陈仲鱼手校本书录与鉴定

考订伊始,似宜先对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作一书录和鉴定,而撰作书录之前,则不妨先读一读书中的陈仲鱼手跋。跋曰:

书贾徐凤辉自江宁考棚归,取道常州,得明神庙时东阳徐子器所刊《蔡中郎集》十卷,持以示余,因亟购之。遂借吾友黄尧翁影钞明锡山华氏兰雪堂活字本,用黄笔校之,复以朱笔校朴学斋旧抄本,以墨笔写录顾千

^①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卷二二“汉魏六朝别集类”著录蔡邕文集有明正德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明影刻兰雪堂铜活字本、清影钞兰雪堂铜活字本、明嘉靖三年宗文堂郑氏刻本、明嘉靖二十七年杨贤刻本、明万历八年茅一相文霞阁刻本、明王士贤刻本、明程荣刻本、明万历三十九年马维骥刻本、清顺治刘嗣美刻本、清咸丰二年杨氏海源阁刻本,以及有黄丕烈、顾千里、孙星衍、李文藻、瞿镛、赵之谦、许瀚、严可均、丁丙、郑振铎等校抄题跋的名家批校本三十余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集部上第15至17页。

里校语,其菟翁三跋,各依其色书之,凡半月而校竣。是书活字本流传盖寡,即此徐刻十卷亦不可多得矣,宝之。嘉庆十二年十月朔,郭海陈鱣记于津逮舫。

跋文似已交代清楚:这是陈仲鱼在其购藏的明万历徐子器刻十卷本《蔡中郎文集》上,用黄、朱、墨三色分别校勘黄菟圃影钞明锡山华氏兰雪堂活字本、朴学斋旧抄本,并过录顾千里校跋和黄尧圃跋的一个手校本。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于嘉庆时已“不可多得”,流存至今者,固宜归入善本之列^①,而此本之珍善,更在于出自乾嘉名家陈仲鱼之手校手跋。兹以通行之例,试作书录于下。

《蔡中郎文集》十卷《外传》一卷(阙卷三至五),(汉)蔡邕撰。明万历二年(1574)陈留县令东阳徐子器刻本,清陈鱣校跋并过录顾千里校跋、黄丕烈跋,清罗以智校。三册。匡高20厘米、宽14厘米。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上题“蔡中郎集”,版心中刻卷数、叶次。正文卷端首行顶格题“蔡中郎文集卷之一”,次行低三格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传”。卷前载明万历元年(1573)王乾章《蔡中郎文集叙》、宋天圣元年(1023)欧静《蔡中郎集序》(首页前半页抄配)、《蔡中郎文集目录》。卷末载明万历二年(1574)徐子器跋。《外传》卷终载陈鱣嘉庆十二年(1807)跋。

卷首钤“番禺陶氏爱庐藏书印”(朱文大方印)、“坦荡荡斋藏”(白文方印)、“藏之名山”(朱文长方印);《目录》首页钤“仲鱼图像”(朱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监我”(白文方印)、“敦复过目”(白文方印)、“心赏”(朱白文方印)、“唐仁寿读书记”(朱文长方印)、“认字室”(白文方印)。卷一卷端钤“仲鱼手校”(朱文方印)、“鱣读”(白文方印);卷六、卷九卷端钤“仲鱼手校”(朱文方印)、“敦复过目”(白文方印);徐子器刻书跋后钤“敦复过目”(白文方印)、“坦荡荡斋藏”(白文方印);陈鱣跋末钤“中”“子”(二朱文小方印)。

按,此本原缺卷三至五凡三卷,后经书商伪装,于各册书根分别题写册数“一”、“二”、“三”,于第一册书根写“凡三”一字,造成各册联接不缺之假像,以售以残充全之奸。又原本卷首宋欧静《蔡中郎文集叙》阙首叶前半叶,卷末明徐子器跋阙末叶后半叶。书商乃将明王乾章《蔡中郎文集序》移至欧叙前,以掩开卷抄补之绌。

鉴于撰者蔡邕、校者陈鱣都是名家,二人事迹多载史籍文献,固毋需循例

^①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蔡邕文集无“明万历二年徐子器刻本”,然据查验,191号“明刻本”,共十家收藏单位,其中上海图书馆藏本实即徐子器刻本,其它不明。192号“明刻本,清黄丕烈、顾广圻校并跋”,国家图书馆藏,亦为徐子器刻本,且系黄丕烈旧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第16页。

再作小传。而欧静、王乾章、徐子器三篇跋文,虽非常见文献,却也都能从通行的海源阁刻本《蔡中郎集》中检索到,故亦不再赘录。惟陈仲鱼过录黄顾题跋,虽亦皆见录于《菟圃藏书题识》、《思适斋集》而寻常易得,但因关乎陈仲鱼手校本的考证,故仍全文移录:

此活字本《蔡中郎文集》十卷,藏钱唐何梦华家。梦华过吴门,行篋携之,因丐归,校明神庙时徐子器刻本,殊多是正。后为余友顾千里、袁绶阶转假去,各影写一部。而余所校者,适为千里携往江宁,案头竟乏展阅本,遂命门仆用旧纸影钞全帙。其卷首碑牌空二格,系俗子剜去年号,以“至正”伪之,故不之补。至于活字版刊刻时代,以他书证之,当在成、宏间。钞毕并记,嘉庆丙寅秋七月丙午朔菟翁黄丕烈。(墨笔)

覆取周香严家藏钞本校。旧钞系朴学斋所藏,前无序有目,分卷多同,行字互有得失,终以旧钞为胜。惜行草笔划未能明了,故传活字本,而以旧钞校之,参取两本之胜处可矣。白露前一日书于百宋一廬之北窗,菟翁。(朱笔)

嘉庆丁卯正月望前,千里以前假校本检还,其中有千里校语颇精当,因录于此以备观览。复翁。(墨笔)

以上三篇黄菟翁跋均见录于《外传》卷终后半页陈仲鱼题跋之前。

丁卯正月校读一过,凡订正若干条。中有绝精处,索解人不得矣。思适居士。(墨笔)

五月再校于江宁,用《后汉书》参订,又添若干条。廿一日灯下记。(墨笔)

此活字版似据一行书写本作底子,故“数”误为“如”,“闲”误为“困”之类,往往而有。若得宋本,必多是正也。九日灯下又记。”(墨笔)

以上三篇顾千里校跋均见录于《外传》卷终前半页末行空白处。

根据对该刻本字体、印纸、序跋等版本特征的验证,并持与上图藏徐子器刻本比对,可以认定其确为明万历二年徐子器刻本。又通过对密布于印本天头、地脚、行间的批校文字的笔迹辨识,对“仲鱼手校”、“鱣读”、“仲鱼图像”、“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监我”等陈仲鱼藏书印章的比对辨伪,并经由同行专家的目验首肯,可以认定其确为陈仲鱼手校真迹。

二、陈仲鱼手校本藏弃源流

考订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的版本藏弃源流,对其真伪鉴定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一个向来“寂寂无名”者的突然出现,难免会让人多生疑窦。

据文献记载,“仲鱼既歿,遗书散佚”,“鱣以嘉庆二十二年下世,手校手著,尽为苕贾所得”云云^①,说的都很笼统,仅海宁蒋生沐《东湖丛记》所记,稍

^①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

稍交代了其书的具体流向：“吾乡陈仲鱼征君向山阁藏书，大半归马二槎上舍。”^①马二槎名瀛，是稍晚于陈仲鱼的海宁藏书家，近水楼台，自先得月。那么，这部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是否也在马瀛所得“大半”之中呢？今检马瀛《吟香仙馆书目》卷四集部别集类著录：“《蔡中郎集》十卷《外传》一卷，汉蔡邕撰，明锡山华氏兰雪堂活字铜印本。又一部，万历本，黄尧圃、陈仲鱼校本并跋。”^②其“又一部”者，著录“万历本”、“陈仲鱼校跋”，均与此手校本符契相合，但云“黄尧圃校跋”，与手校本之过录黄校实不相符，难道是马二槎未及细考所致？又陈仲鱼手校本没有加盖马二槎藏书章，莫非藏主忽尔转手而未及加盖？虽然尚存此小小疑点，但皆属可以理解的差失，所以大体上还是可以认定《吟香仙馆书目》著录之“又一部”，就是仲鱼身后流出的那部手校本《蔡中郎文集》，而这也是此本在书目著录中的唯一“现身”。那么，在马二槎之后，此本又流入何处呢？虽无书目参考，但尚可依赖藏书印章来稍加追究。

据卷首钤印“唐仁寿读书记”，可知此本后又移藏与马二槎同为海宁藏书家的唐仁寿家。按唐仁寿，字端甫，号镜香，家饶于财，购书累数万卷^③。据云唐氏藏书厄于咸丰八年兵燹，荡然无存，而此本安然无恙，流传至今，则知其必在此前已经幸而转归别家。又据卷首钤有“番禺陶氏爱庐藏书印”，乃知此本后归岭南藏书家陶福祥。按福祥字春海，广东番禺人，陈东塾门生，张南皮主政两广，聘为广雅书局总校，家富藏书，且喜刻书^④。陶福祥于光绪十六年（1890）主持覆刻杨氏海源阁刊本《蔡中郎集》，陈仲鱼手校本归其收藏，也可谓得其所哉。陶福祥有子名敦复，书室名“坦荡荡斋”。此仲鱼手校本多处钤印“敦复过目”、“坦荡荡斋藏”，知福祥身后，此本仍在其子敦复手中。至于何时从陶氏藏书室流出，转至津门书肆，则未可知晓。但根据这些收藏印鉴，判断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藏弃源流之大概，亦可佐证此本之真实不伪。

除藏书印章可以作证外，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还曾确实在书目之外的其它文献上有过“现身”，这部文献就是清罗以智撰《蔡中郎集举正序》。

①（清）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四《马二槎藏书记》。徐蜀主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1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②（清）马瀛：《吟香仙馆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③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57页。

④参见（清）梁鼎芬等纂修《番禺县续志》，民国20年印本。又徐绍桀《广东藏书纪事诗》“陶福祥爱庐”条，诗曰：“谿经铸史盛名传，吾爱吾庐也夙缘。结习未忘事铅槧，苏书陶集字如钱。”又小传曰：“陶福祥，字春海，番禺人，光绪丙子举人，学海堂学长、禺山书院院长，大儒陈兰甫之弟子。富藏书，所藏珍秘本必钤爱庐印章。其管理学海堂文澜阁所印书，精选纸墨，发兑处名谿经铸史斋。又于藏书之精者选择雕刻，如《蔡中郎集》、《朱韦斋集》、《陈后山集》、沈括《梦溪笔谈》、汪师韩《文选》、《理学权与》等，均精于雠校，而胡伯蓊手写苏书陶集，字大如钱，尤为精绝。”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20辑，第213-214页。

序曰：

（劳）季言自有校本，又藏有袁寿阶过录千里校本，余又曾见陈仲鱼过录千里校本，两本亦有异同，新刊本中有未之采列者，伯平所谓“顾校尚有别本”是也。^①

罗序落款署年“咸丰四年甲寅仲冬之月”。

罗以智，字子敦，又字镜泉，浙江钱塘人，尝官镇海教谕，无意仕进，耽于经学，著述极富，且家富藏书，书楼曰“吉祥室”，其《吉祥宝藏书目》所录不下数千百种，咸丰十年避乱海昌，人歿书散^②。按罗序云“曾见陈仲鱼过录千里校本”，是其仅见而未藏也。又序称“两本”，乃指劳季言所藏“袁寿阶过录千里校本”与罗以智所见“陈仲鱼过录千里校本”。而其言之凿凿，谓“两本亦有异同”，则必经罗氏持本对较可知。至于罗序提到的“新刊本”，正指聊城杨氏海源阁刊本《蔡中郎集》也。按杨本的实际校刊者是高均儒，字伯平，浙江秀水人。咸丰三年（1853）《蔡中郎集》刊竣，高伯平尝以新刊本示罗以智，属复加校勘，结果造就了罗氏《蔡中郎集举正》这部校勘学著作。而那时家藏陈仲鱼手校本的唐仁寿，还曾从孙诒让处转录过罗以智的《举正》稿本^③。其间缘由曲折，自非区区拙文所欲探究，第举此一事再为佐证：嘉庆十二年（1807）陈仲鱼于己藏万历徐子器刻本上“以墨笔写录顾千里校语”的手校本《蔡中郎文集》，是确实的历史存在而非后世的伪作臆造。

更令人喜出望外的发现，是在此本密密麻麻的数千条校语中，竟然“藏匿”了一条罗以智的校语！这条罗校位于卷二终页末行栏上，书写在陈仲鱼朱笔手校“‘尔’字在‘来世’上”一行左侧。罗校曰：“以智按，‘上’字为‘下’字之误。”按陈仲鱼的这条校记，原是对徐子器本“嗟尔来世”一句的出校，但若依陈仲鱼说旧钞本“‘尔’字在‘来世’上”，则与徐本文字原无差异。既然与徐本一致无异，又何必出此校记？故罗校认为旧钞本当作“嗟来世尔”，“尔”在“来世”下而非其上，陈校“‘尔’字在‘来世’上”是其笔误。细验此行罗校，笔划纤细如丝，字迹显异陈体，翻阅书卷，检阅前后，若有似曾相似者，却再未找到有“以智按”三字的校记。虽难掩“失望”之情，但即此唯一的“以智按”校记，似亦能证明此本正是罗以智当年撰著《蔡中郎集举正》时“曾见”

①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卷22“汉魏六朝别集类”著录：清罗以智撰《蔡中郎集举正》十卷，清光绪5年朱桂模抄本，藏浙江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第18页。此引罗序转引自王欣夫著《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下册甲辰稿卷四《蔡中郎集举正二卷附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60-1361页。

②参见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页；又王欣夫《蔡中郎集举正二卷附佚文》，第1359页。

③按，据王欣夫考证，“可知伯平之校，镜泉或曾参与其事”，海源阁蔡集刊竣宜在咸丰九年而非三年，又记述唐仁寿抄录罗氏《举正》稿本事，均见载氏著《蔡中郎集举正二卷附佚文》，引书同上。

的那个“陈仲鱼过录千里校本”。

三、陈仲鱼校跋及其籍贯与印章（图见封二）

其次要讨论的是陈仲鱼题跋，以及跋后落款“郭海”和钤印“中”、“子”的问题。

按陈仲鱼有自编文集《简庄缀文》六卷，成于嘉庆十二年四月，这篇《蔡中郎文集跋》撰写于嘉庆十二年十月，当然不可能收入。又嘉庆十八年编就《经籍跋文》，但此集专收经籍题跋，自然也与《蔡中郎文集跋》无干。仲鱼身后，光绪十四年，有海昌羊复礼重刊《简庄缀文》于粤东，改题书名曰《简庄文钞》，并辑其佚文编成《简庄文钞续编》二卷，与《简庄文钞》、《河庄诗钞》合刻行世。但经查《续编》并未收录此跋。民国间，王欣夫先生亦尝有补辑之作，王氏著《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著录“《简庄文钞补遗》二卷，一册，清海宁陈鱣撰，吴县王欣夫辑，蛾术轩钞稿本”。提要曰：“仲鱼《简庄缀文》六卷，编定于嘉庆十年，时五十三岁。光绪十二年羊复礼重刻《缀文》于粤东，易名《文钞》，而别辑遗文为《续编》二卷。余尝得而读之，尤爱其序跋各篇考据精覆，不在潜研堂下。平日浏览所及，得未刻题跋数十篇，又于谢启昆《小学考》、王德浩《硤川续志》各得散文若干篇，因合钞为《补遗》上下卷，以俟他日有合刊者。”^①此蛾术轩钞稿本今存复旦大学图书馆，据查亦无仲鱼此跋。迩来则有陈鸿森先生的研究成果，即于1988年、2002年先后刊发的《陈鱣简庄遗文辑存》、《陈鱣简庄遗文续辑》二文。《续辑》刊登在《书目季刊》，经查并无收辑。《辑存》刊载于《大陆杂志》，一时无从检阅，迄今未获拜读。然鉴于此手校本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归华东师大收藏，且从未对外宣示，故宜其亦无缘获见而不得辑录。所以，能基本确定的是，我们在考实了这部陈仲鱼手校本《蔡中郎文集》的同时，还收获了清代校勘名家陈仲鱼的一篇重要跋文。

与跋文相关连的是其落款题署“郭海陈鱣”的问题。陈仲鱼书跋落款题署通常称“海昌”或“海宁”，那是他的籍贯，有时亦书“渤海”或“郭海”，那是他海宁陈氏家族的郡望。字书“郭”即“渤”，《说文》“郭海，地名”，汉设渤海郡，《汉书·武帝纪》作“郭海”，《封禅书》作“渤海”，《杨雄传》作“渤漭”。关于陈鱣家族郡望渤海的问题，陈鸿森《清儒陈鱣年谱》尝据吴兔床《愚谷文存》有所交代：“又〈渤海陈氏家乘补跋〉云：陈于宁为右族，本姓高，为宋武烈王琼之裔。明初，有赘于陈者，遂蒙其姓。自宋、元、明迄本朝，数百年来，簪纓科第之盛，非他族所能及。”^②年谱指出是宋高琼裔孙入赘海宁陈氏而改姓，但未揭示高琼与渤海究竟是何关系，所以还是没能解出何以题署“郭海陈鱣”的来

①王欣夫著《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未编年稿卷四《简庄文钞补遗》，第1677页。

②陈鸿森著《清儒陈鱣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199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期，第160页。

由。考《宋史》高琼本传，仅称高琼“家世燕人”，也未说是渤海人。所幸查阅清光绪十七年刻本陈赓笙纂修《海宁渤海陈氏家谱》，得偿所愿。据是谱卷十三“世传”九“第十五世”世系，载有陈鱣之名并附小传，卷二十六载有《第十五世举孝廉方正简庄公传》，是一篇较详细的陈鱣传记。又卷三“世系”记载陈鱣“一世祖秦，吏部尚书、中书令公”，曰：“公讳秦，字子伯，渤海蓍人，汉渤海太守讳洪之后也。”卷四“世传首”曰：“后汉量十世孙洪，渤海太守，因家渤海蓍县。”^①又据卷二十四《第一世迁祖处士东园公传》，知其族世奉始迁祖名谅，字克贞，号东园，生于元末，赘海宁东里长平乡陈氏，生子荣，字世宏，号月轩，承母姓为陈氏，生于明洪武壬子，卒于宣德丙午^②。陈仲鱼即始迁祖东园公之十五世裔孙。陈仲鱼家世虽然有了着落，但《后汉书》高洪无传，海宁陈氏郡望渤海高氏之渊源，仍不得其详。考虑到陈赓笙《谱》残缺前二卷，有可能丢失了记载家世来源的谱序等资料，所幸陈赓笙《谱》的前修谱，即清嘉庆十年陈应麟纂修《海宁陈氏家谱》尚在，经查检有“乾隆元年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世孙元龙”撰写的谱序，将“渤海高氏”至“海宁陈氏”的来由，娓娓道来。序曰：

唐虞时，我远祖伯夷为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赐姓曰姜，赐氏曰吕。《传》所谓“天子建德，赐之姓而命之氏”者是也。阙后太公封于齐，公族以王父字为氏曰高，与齐为终始焉。后汉渤海公官太守，而渤海之高大著。历魏晋北朝隋唐间，望甲天下。宋初盛于汴，南渡后盛于临安。迨于元季，我迁祖东园公赘宁，二世而月轩公蒙母姓，曰海宁陈氏。^③

“郭海陈鱣”来由，藉此豁然明朗。概言之，陈仲鱼之海宁陈氏家族，追溯先世，奉始祖后汉渤海太守高洪，因居渤海郡蓍县，遂为渤海著姓望族；洎入赵宋，武烈王高琼有功，赐第汴京，而汴之高氏大著；靖康之难，琼子孙有随高宗南渡者，迁居临安；元季东园公谅入赘海宁陈氏，奉为始迁祖，明初二世月轩公荣

①（清）陈赓笙纂修《海宁渤海陈氏家谱》，清光绪十七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馆藏号JP1978。

②案《第一世迁祖处士东园公传》追述海宁渤海陈氏家族迁徙始末，颇具史料价值，兹特节引以飨读者。传曰：“公讳谅，南江公讳泗之长子也。故家仁和黄山，少从南江公肄业海宁东里，状貌英伟，读书敏悟绝人。陈公明谊无子，见而异之，欲妻以女。南江公卜之龟拆，占者曰不必问休咎矣。南江公投之于河。有老渔攫而视之，曰：‘此大吉之兆也。拆文弥布，具太极图形。太极，万物之祖。是谓一姓肇始，莫之与京，光远有耀，异域钟英。君其识之。’南江公知非凡人，问其名居，不告而退。南江公归，遂委禽焉。逮长就婚，明谊公悉以其资予公。生月轩公荣，而蒙其姓。公以先世仕宋，累受宋厚恩，故命其里曰赵家桥，子孙聚族，衡宇数里相望，迄今三吴推右族，必曰赵家桥陈氏，有自来矣。”《海宁渤海陈氏家谱》，清光绪十七年刻本。

③（清）陈元龙撰《海宁渤海陈氏家谱序》，载（清）陈应麟纂修《海宁陈氏家谱》卷首，清嘉庆十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馆藏号JP1079。

生,改从母姓,遂称海宁陈氏;自后世世繁衍,遂成海宁大族,清初陈元龙、陈世倌等名臣,皆出其族。“海宁陈氏”不仅因由渤海高氏后裔入赘改姓而兴族著姓,而且其迁徙海宁的先祖“在岩门者仍高姓”,“二氏子孙,其相接昭穆,未尝少假借”^①,故其追溯高氏先世居地渤海为家族郡望,正在情理之中。

考证“郭海陈鱣”的缘由,原非考订仲鱼手校本之必需,然因跋文题署而附带探明渤海是海宁陈氏家族郡望,并查证陈鱣家谱,厘清陈鱣家世,可补陈鱣年谱之不足,似也不失为一个小小的意外收获。

“郭海陈鱣”毕竟还在其它陈仲鱼题跋上出现过,而“中”“子”两方朱文小印,更似“独无仅有”。陈仲鱼使用的藏书印在明清藏书家中大概最多,“仲鱼图像”、“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监我”、“临安志十卷人家”、“陈鱣所藏”、“陈仲鱼家图书秘册”、“海宁陈氏向山阁图书”、“向山阁图书”、“海宁陈氏珍藏书画金石之印”、“陈仲鱼家图书”、“陈仲鱼读书记”、“海宁陈鱣观”、“鱣观”、“鱣读”、“仲鱼过目”、“仲鱼手校”、“陈仲鱼手校”、“陈鱣考藏”、“简庄所录”、“简庄艺文”等,都是众所熟识者,唯独“中”“子”连铃的这两方朱文小印,十分陌生鲜见。印章应该不是伪作假冒,因为制作罕见的印章不合作伪的逻辑。那么“中”“子”究竟是何意思呢?“中”“子”连铃宜即“中子”之义,中子亦即排行居中之子。那么陈仲鱼是否家中的中子呢?据《海宁渤海陈氏家谱》记载,仲鱼之父名璘,字昆玉,生子二,长子鱣,次子豹,则仲鱼并非中子。不过仲鱼伯父陈珂,字可玉,亦生有二子。据陈仲鱼《祭弟文》曰:“先大父享年七十,未得抱孙,既而伯、父连举伯兄、叔弟,及我与弟相继之。”^②可知这二位从兄弟,一长于仲鱼,一幼于仲鱼,以排行计,仲鱼可谓“中子”也。是以“中”“子”印章之义得以坐实,而陈仲鱼藏书印“家族”中又添一新成员也。

四、陈仲鱼校本与黄尧圃、顾千里校本

最后再讨论陈仲鱼手校本与黄尧圃、顾千里校本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或许能解开“陈仲鱼过录千里校本”与“袁寿阶过录千里校本”何以“两本亦有异同”之疑。

陈仲鱼手校《蔡中郎文集》的来龙去脉,仲鱼校跋似已交代清楚:“遂借吾友黄尧翁影钞明锡山华氏兰雪堂活字本,用黄笔校之,复以朱笔校朴学斋旧抄本,以墨笔写录顾千里校语,其尧翁三跋,各依其色书之。”但若咬文嚼字细细想来,还是有些细节处不甚明了。比如,陈仲鱼借黄尧圃影钞明兰雪堂铜活字本来校他刚购藏的徐子器刻本,这个环节没有疑义,但“复以朱笔校朴学斋旧抄本”就可有不同理解,究竟是直接校的周香严藏朴学斋旧抄本,还是过录尧圃校朴学斋旧抄本?又说“以墨笔写录顾千里校语”,顾千里校跋《蔡集》有好

①(清)陈应麟纂修《海宁陈氏家谱》卷二十《宅里志》。

②(清)陈鱣《祭弟文》,清光绪刻本《简庄诗文钞》卷六。

几个本子,陈仲鱼“写录”的又是顾校的哪个本子呢?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似应先把黄尧圃收藏与校跋的《蔡集》版本弄清楚。

今且以黄、顾书跋为文献依据,作一大致描述。起初,黄尧圃收藏了一部明嘉靖乔世宁刻本《蔡中郎集》六卷(或称杨贤刻本),系常熟钱遵王“述古藏弃”旧物,黄取与顾共同赏鉴,并留下尧翁题跋一则、顾千里题跋二则。但顾千里“见示一望,决其不佳”,并“举卢抱经所言《蔡集》以天圣年间欧静所辑本为最古”,且“谓六卷本实误本之祖,欧本自在天壤间,何不留心搜访之”。按照顾千里的提示,嘉庆十年正月,尧圃果然在吴中胥门书坊经义斋获购“欧本”,即从洞庭叶石君朴学斋流出、前有宋天圣欧静序的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十卷^①。尧翁既得之,遂借得书友周香严藏叶氏朴学斋旧钞本,以朱笔校勘徐本之上。校未毕,又从何梦华处借得明锡山华氏兰雪堂铜活字印本《蔡中郎文集》十卷,校正徐本殊多^②。而在此期间,顾千里亦曾将此活字本影写一部,并将黄校徐本借去江宁,用影写活字本互校^③。尧圃借出己藏徐本后,自觉“案头竟乏展阅”,遂于嘉庆十一年七月,也把兰雪堂铜活字本全帙影钞一过,又在白露前一日,复取周香严家藏朴学斋旧钞本校竟。嘉庆十二年正月望前,顾千

①此据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卷末载黄丕烈题跋:“余所藏《蔡中郎集》六卷本,系述古藏弃者。既而余友顾千里,举卢抱经所言《蔡集》,以天圣年间欧静所辑本为最古。第一卷首篇是《桥太尉碑》,今本移易其篇第,又并篇中颠倒次序,大失其意云云。谓六卷本实误本之祖,欧本自在天壤间,何不留心搜访之?今乙丑正月十有九日,展墓还,道经胥门,憩经义斋书坊,坊中小主人胡立群,颇习目录之学,持明刻《蔡中郎集》示余。余始犹以为六卷本,无足重。立群云此十卷本也,晁、陈两家皆以十卷为善,见行本皆六卷矣。余开卷见有《故太尉乔公庙碑》,知与卢说合,且有‘朴学斋’、‘归来草堂’两图记,知为叶石君旧藏,何幸而得此以践千里‘留心搜访’之语邪!复检《钟山札记》,果与之悉合。爰题数语,以证此本之善。至是刻为明神庙时徐子器刻,特未知抱经所见又何本尔。嘉庆乙丑春二十日,是为雨水节。尧翁识。”

②此据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载黄丕烈题跋:“余初得此刻,即借香严书屋所藏旧抄本校勘,钞本亦出朴学斋,与此刻同是叶石君所藏。然钞刻分卷同而文理殊不同,取校此刻,大有增损。即有钞本似误者,今悉仍之,通体朱笔是也。尧翁。”又:“借钞本校未毕,适钱唐何梦华行篋中携得华氏活字本,参校知钞本为最佳,活字本近之。且钞本皆行草,事体有未明晰者,可以活字本参之。书之不可不多本相勘,如是如是。尧翁又识。”

③此据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载顾广圻题跋:“兰雪堂活字版本校,七月二十有九日覆校,同日覆校。”“《蔡中郎集》予向未究心。尧翁得述古堂所藏六卷本见示,一望决其不佳。后遂别得此本,又再三覆勘。予亦影钞兰雪堂本一部,相从借阅,偶有所见,记之于上方,皆显然旧并不误,而徐子器刻时妄改者也。夫六卷本无足论,即十卷本,其佳恶不同如此。书以弥古为弥善,可不待智者而后知矣。乃世间有一等人其人尧翁门下士也,必谓书无庸讲本子。噫!将自欺耶,将欺人耶?敢书此以质尧翁。丙寅十二月洞黄居士。”

里把校毕的徐本归还堯圃，堯圃则将徐本上的千里校语过录在自己的影钞活字本上。此后，顾千里在江宁继续用《后汉书》等，校勘他的兰雪堂铜活字影写本。是年十一月，千里归吴门，堯圃前“往候之”，千里“因出手校《蔡集》，共为欣赏，其中精语较前正月所校本益多而益精”，堯圃“遂袖归，录于影写活字本上”。^①

据上所述可知，黄堯圃实有二部《蔡中郎文集》十卷校本，一部是他在嘉庆十年从胥门经义斋书坊购藏的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十卷，上有堯圃手校兰雪堂铜活字本、朴学斋旧钞本，以及顾千里手校影写活字本校记。另一部就是堯圃于嘉庆十一年七月命门仆影钞的何梦华藏明兰雪堂铜活字印本《蔡中郎文集》十卷，上面也有堯圃手校周香严藏朴学斋旧钞本，并过录顾千里前后二次校记。

陈仲鱼手校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时在嘉庆十二年十月，那时黄堯圃的二个校本都在手边，只是影钞兰雪堂铜活字印本上尚未过录顾千里的后一次校记。那么，陈仲鱼究竟借用堯圃哪些本子来校他的徐本呢？推论可以有好几种情况：一、直接据何梦华藏活字本、周香严藏旧钞本校，用黄校影钞活字本或黄校徐本过录顾校。二、据堯圃影钞活字本校，并过录其上黄校旧钞和黄录顾校。三、据堯圃藏徐子器刻本，过录黄校活字本、旧钞本和黄录顾校。当然，还可以按照与活字本、旧钞本的不同排列组合，再增加几种可能性，但那样的概率很小，一一胪列不免繁琐。推论再合乎逻辑，也无法得出准确答案，最理想的是黄堯圃二部校本都在，持之雠校，立马可断。

那么，经由黄、顾校跋的那些《蔡集》版本究竟是存是佚？若存又在何处？有专家考据认为，堯圃藏明嘉靖乔世宁刻本《蔡中郎集》六卷，后归璜川吴志忠、海宁张氏适园先后收藏，去向待考。堯圃藏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十卷，后归聊城杨氏海源阁，民国十八年失佚。顾千里影写明正德兰雪堂铜活字本未见著录。《北图（国图）善本书目》著录“黄丕烈、顾广圻校并跋”的一部明刻本，“或即千里等所校的明兰雪堂本”^②。与陈仲鱼手校本关系密切的二部黄、顾校本，一部失佚，一部竟未提及，结论未免有些令人沮丧。然而，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经过调查审鉴，发现国图著录的那部有黄、顾校跋的明刻本，实即明万历徐子器刻本，而该本卷首欧静叙页钤印“堯圃手校”、“宋存书室”，卷一首页钤印“百宋一廬”、“彦合读书”，卷终徐跋末钤印“东郡宋存书室珍藏”，则确凿证明，它正是被称“失佚”的、原藏黄堯圃百宋一廬、后归杨以增海源阁的黄校徐子器刻本，而非原先推测的“千里等所校的明兰雪堂本”。无独有偶，巧幸成双，真正的堯圃影钞兰雪堂铜活字本，也

①参见本文所引陈仲鱼手校本过录黄堯圃诸跋。

②参见李庆：《顾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9—411页。

在不久前出版的《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中浮显“真身”^①。又据网络显示,陈祁阳原藏黄丕烈影钞明锡山兰雪堂铜活字本《蔡中郎文集》十卷,已于2008年由嘉德拍卖行以573万人民币拍卖成交,惜未知新主谁人。秘藏何处。

因为有了“真本”,陈仲鱼手校《蔡中郎文集》的“情景”就能大致“还原”。经过与《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书影比对,可以看出仲鱼当初用以校勘的本子,应该就是黄尧圃影钞兰雪堂铜活字本,包括他用“朱笔校朴学斋旧钞本”、“以墨笔写录顾千里校语”,都是从尧圃影钞本过录而来。这样判断的依据是,陈仲鱼手校本上的旧钞本校、顾千里校及黄、顾题跋,不但文字、笔色与尧圃影钞本相同,而且在天头地脚、卷前卷后所处的位置也几乎完全相同。若非依样过录,很难出现这样的雷同。

不过陈仲鱼手校本也并非悉同黄尧圃影钞本。不同之一是少了二篇黄跋、一篇顾跋。黄尧圃影钞本中,前一篇黄跋写于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之后,题于第三篇黄跋之后。跋曰:

十一月五日,千里自江宁归,余往候之,因出手校《蔡集》,共为欣赏。其中精语较前正月所校本益多而益精,遂袖归,录于余影写活字本上。盖《蔡集》自千里与余互为商榷,而余始得十卷徐子器刻本,又借得何梦华所藏十卷活字本、周香严所藏十卷旧钞本,悉校于徐刻上,千里遂借余校本而读之,析疑义如右。则《蔡集》之可以校证者,固由千里能读之功,而余搜求之力,亦颇有焉。录校毕,复识其缘起。复翁。

后一篇黄跋撰于嘉庆十三年十一月九日,因末页末行已无空间,故细字题写在前页第一篇黄跋之后。跋曰:

戊辰夏于骨董铺又见一活字本,拟购之。因时方盛行旧板书,初索十番,后积累至几十金,未及收得,殊为恨事。十一月十九日,复翁。

陈仲鱼手校本无此二跋,实属正常,因仲鱼校竣之日,此二篇黄跋还未题写。至于所缺顾跋一篇,原在影钞铜活字本卷首欧静《蔡中郎文集序》前空白页上。跋文曰:

东汉人文集存于世者仅此一种,尚是宋以前人所编,其余无之矣。又此集与今文家之学有关涉,尤学者所不可废。此予所以亟亟费日,力为之订正再三者也。思适居士书。

陈仲鱼手校本无此顾跋,很可能是流传过程中的缺失。该本欧静序第一页前半页系后人抄配,疑其原页连同卷首空白页上的过录顾跋也一起丢失。书商为掩人耳目,故意把欧静序调置王乾章序后。故陈仲鱼手校本缺少尧圃影写活字本三篇黄、顾题跋,并不影响陈校出自黄本的判断。但陈仲鱼手校本还是有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编:《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三册第169页,第十二册第5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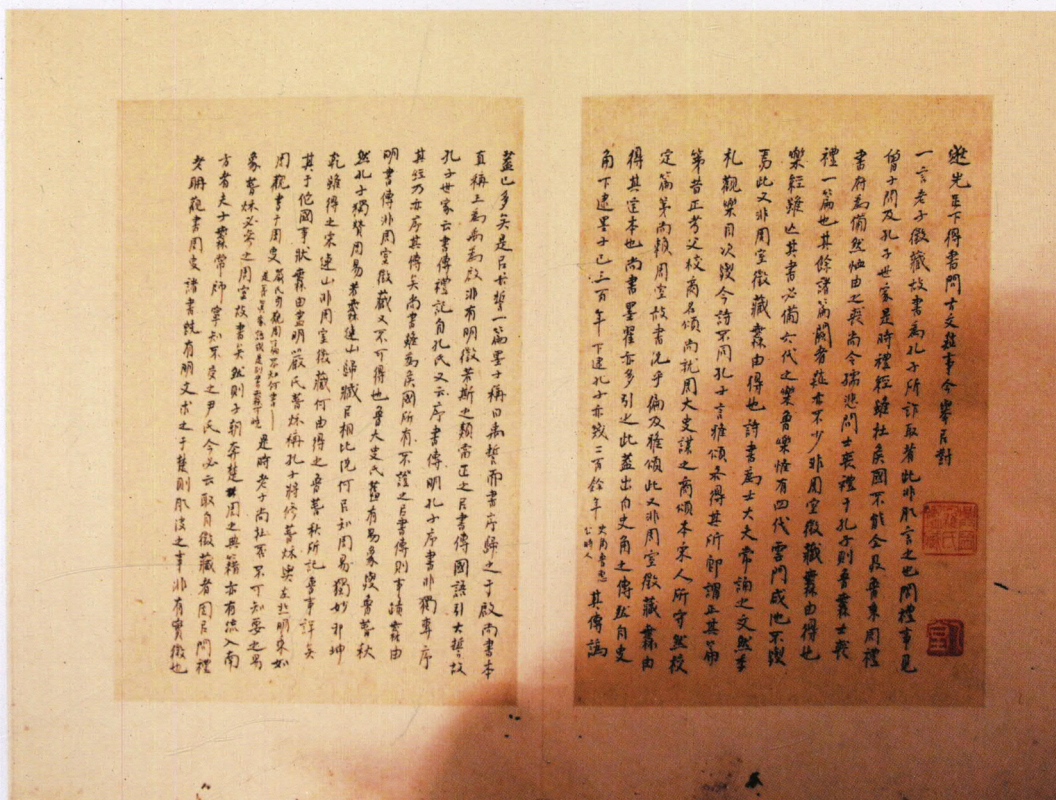
一不同处,显示其亦非悉依堯圃影钞本原样过录,那就是他过录的个别顾氏校语,多了“顾云”二字。陈仲鱼过录顾校加此二字,其意固能理解,但何以仅仅是个别而非所有全体?加与不加“顾云”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潜藏的陈校“义例”,则颇难晓喻。或许因为目前能用以版本比对的还仅仅是有限的几页书影,难免“见木不见林”之敝,倘若日后能得真本全帙细细校比,或许尚能看出其中缘由。

根据上述考证,可以知道“陈仲鱼过录千里校本”与“袁寿阶过录千里校本”,之所以“两本亦有异同”,即在于前者录自黄丕烈影钞明铜活字本,后者源于黄氏旧藏明徐子器刻本。而由此也可评估陈仲鱼手校本的价值:倘若存世的黄堯圃影钞铜活字本被束之高阁,秘不示人,则陈仲鱼手校本可作“次一等真迹”文献之用,唯残缺三卷,致使其文物、文献价值,俱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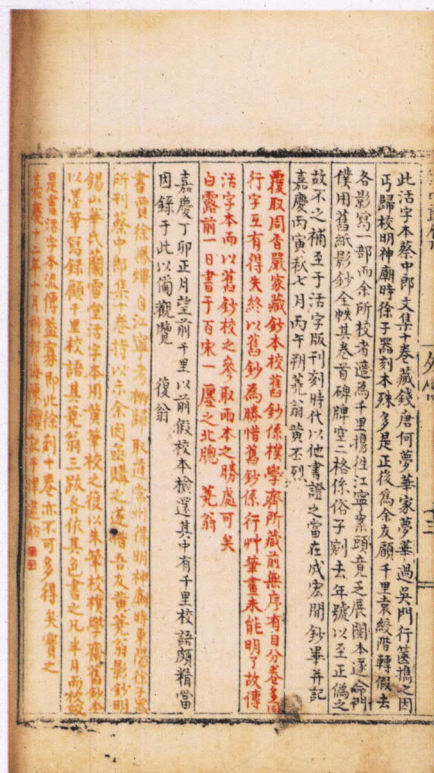
行文至此,不禁生出遐想:不久将来,现仍隐身民间的黄丕烈影钞明锡山兰雪堂铜活字本《蔡中郎文集》十卷,能与国图藏黄氏旧藏明徐子器刻本《蔡中郎文集》再度合璧!而华东师大藏陈仲鱼手校徐刻本《蔡中郎文集》残缺遗落的三卷一册,也在“浪迹天涯”之后,能再现人世而终归完璧^①!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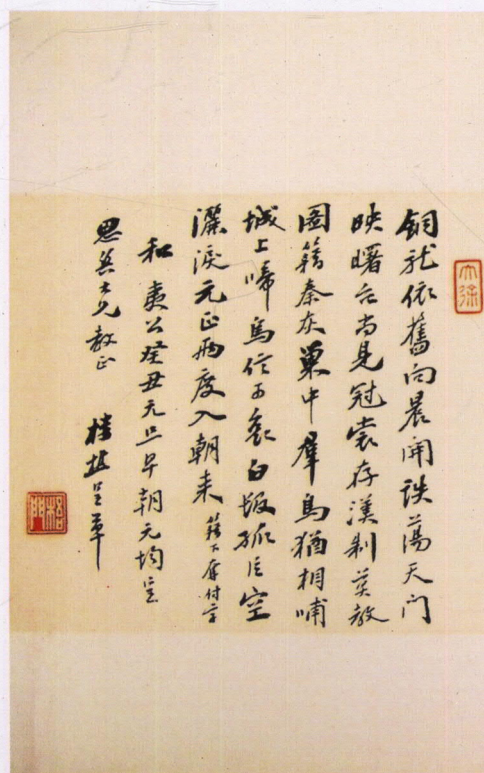
^①本文撰写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丁小明博士慷慨提供信息,谨此致谢。



文见第 97 页



文见第 60 页



文见第 187 页